



佛教律、规阅读札记

◎ 鲁立智

中国佛教的戒律与清规,是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中国佛教特殊的文化背景。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教清规戒律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虽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繁简趋向,但无可否认,其中的部分内容被简化、被遗忘了。重检佛教的律、规,竟然发现,近现代才被国人普遍接受的近代的或西方的文化概念,有些在千百年前早已经存在于僧侣的日常生活中。

一、餐 巾

餐巾,是用餐时放在膝上或胸前的一种布巾。提起餐巾的使用,人们普遍承认这是近代由西方传入的用餐规范。然而,在佛教的清规中,却明确记载着宋代僧侣们使用餐巾的情形。

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组织的规程和寺众日常行事的章则,清规的最早著述,是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所撰的《百丈清规》,至北宋初期,此一清规已经散佚,禅林规则因此颇为紊乱。宋代崇宁年间,宗赜为复兴《百丈清规》之精神,搜集残存于诸山的行法偈颂,撰成《禅苑清规》。这一清规中,有僧侣用餐时使用餐巾的详细记载。

首先,清规中规定了禅宗僧人可以拥有的个人物品,在卷一的“办道具”条规定:

将入丛林,先办道具。所谓为山笠、拄杖、戒刀……净巾三条(一盖被,一吃食,一常用)……

这里的净巾,其中一条便是吃饭时使用的。如何使用呢?同卷的“赴粥饭”条规定:

展钵之法:先问讯,解复帕,取钵拭,叠令小,及匙箸袋,当面近身横放,次展净巾盖膝……行食之法……受食之法……吃食之法……食讫……(此处为僧侣坐在个人用餐的位置上清洗餐具的程序,略)然后叠净巾兼匙箸袋……

此条清规极其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迟在宋代,禅宗僧侣们在用餐时已经使用餐巾(时称净巾或盖膝巾)了。宋代宗寿的《入众日用》及惟勉的《丛林校订清规总要》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后来的天台宗与律宗所制定的本宗的日用规范(天台宗的《增修教苑清规》和律宗的《律苑事规》)中均收录此条,说明了这套规范在宋元时期是受到广大僧众的认可的同时也是得到广泛遵行的。

与现代餐巾的使用略有不同的是,由于宋代僧人必须洗完餐具(钵)之后才可以离开用餐的位置,因此,他们明确规定“洗钵未折水,不得先收盖膝巾”(《入众日用》卷一),由此又可看到,当时的餐巾同时具有厨房中围裙的作用。

宋代僧人使用餐巾的制度,并非起源于宋代,亦非源于中国本土文化,而是有其经典依据的。南朝宋求那跋摩所译《沙弥威仪》中有这样的记载:“拭钵有三事:一者当澡手拭使燥,二者当持净手巾着膝上,三者当拭里使燥,即当持净巾并覆着囊中

着常处。”(此处引文出《永乐北藏》,其它引文均出《大正藏》)

本是印度佛教徒拭钵(清洗、擦拭餐具)时的一种要求,待佛教传入中国,被发展成为用餐始终的一项规范,这也算印度文化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现象吧。然而,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纤小的规范终于被遗弃,以至于时至近代,餐巾竟然成了舶来品。虽然这个规范被遗弃的原因已难以查明,但这多少昭示着中国餐饮文化的些许遗憾。

二、偷 税

偷税一词,在古代典籍中出现得比较少。通过对《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三部丛书的检索,仅于苏轼集中发现一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一条,共二条此词的使用实例,丛书所收录的宋前文献中没有此词的使用记录。上述二条原文如左:

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其偷税之人,并不就海口,收税者许人告,并以船货充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

较之宋代文献,佛教的戒律中却有偷税一词更早的记录。戒律与清规不同,清规是中国僧人因地制宜制定的,戒律却是由翻译者翻译的印度佛教的现成文本,它体现了更加纯粹的印度佛教文化。同时,翻译者又力图以最准确的汉语言表达文意,这样,翻译过程本身,便体现了两大文化的相同点(其中当然涉及到不少佛教特有的文化术语,这部分内容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格义”后,通常由翻译僧以音译的形式翻译,以示区别)。

唐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涉及到了偷税的概念及其相关内容,在卷四十一的“与贼同行学处”第七十一中记载: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有一苾刍……欲往室罗伐城,礼世尊足,出求商旅。时有商人,欲向室罗伐城,此之商人是偷税者,苾刍不知,共相随去,欲至税所,便取余路,偷道而行,时彼税官,伺知偷路,遂便捉获,俱缚将来,知苾刍无过,即便放去。既得脱已,渐至给园……佛言……若复苾刍者……与贼者谓破坏村坊及偷关税同道行者,谓向远处,共为伴侣,乃至一村间,得波逸底迦。

此项戒律在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及其他戒律文献中同样有记载。

在更早的由后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共译的《十诵律》中,也有关于偷税的记载:

若比丘过关逻,应输税物而不输,得何罪?答:“得波罗夷。”若估客语比丘:“与我过是物。”比丘与过,若税物直五钱以上,得波罗夷。若估客到关逻,语比丘言:“与我过是物,税直当与比丘半。”比丘若过是物,税直乃至五钱,若直五钱,得波罗夷。若估客到关,语比丘言:“与我过是物,税直尽与汝。”比丘若过是税物,乃至五钱,若直五钱,得波罗夷。若估客到关,应输税物,比丘示异道令过,断官税物,是税物乃至五钱,若直五钱,得波罗夷。若估客应输税物,未到关,比丘示异道令过,是税物乃至五钱,若直五钱,断官税物故,得偷兰遮。

较之中国佛教,印度佛教要远超脱于世俗的统治势力,但从戒律中可以看到,承认统治者的利益,减少与统治者的摩擦,是印度佛教也要遵循的原则。甚至到了无论僧众知与不知,只要冒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就是触犯了戒律的地步!这样的戒律传到中国,自然会被中国僧人更深入彻底地坚持。

此处所标明的偷税概念要比当代的概念狭隘,当代的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

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行为，而佛教所谓的“偷税”则专指僧人个人逃避关税或者帮助别人逃避关税的行为，与前引二条宋代例文大致相同。

与偷税概念相关的是逃税，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它与偷税不同，它指的是为了躲避赋税徭役而离开所居之处的行为，唐杜佑的《通典》载：“夫家足不在于逃税，国足不在于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赢而国贫。”杜荀鹤《山中寡妇》中所谓“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即是指此。它的大量出现说明了封建的农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它是属于农业社会范畴的词语。

逃税一词在佛教的文献中却很难找到。因为政府基本上是免除了出家人的赋税徭役的，因此逃税对出家人而言便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而出家人贪图财利，帮助商贾偷税，则是关系到佛教声誉甚至存亡的现实问题。这一概念大量出现在佛教文献中，一方面表现了少数佛教徒的真实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业社会的中国，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偷税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词语。

通过重重对比，我们能够明了晋唐时期的偷税实况，感受到那个时代具有的淡淡的商业气息，由于商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偷税的手段也是单一的；同时，又可为偷税一词的词语溯源提供资料，至少已经表明在晋唐时期，这个词语已经被国人所使用。可谓一举两得。

三、拍 卖

与餐巾的使用相似，拍卖行为同样被认为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李沙在其《拍卖行》一书中这样说到：“欧美拍卖之风影响中国，始于近代鸦片战争前后，特别是清道光年间

(1821-1850)，在此之前，拍卖在中国一直是空白。”

如果以近现代拍卖业的标准来界定拍卖行为的话，中国的拍卖业确实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其时，上海和天津是中国的两大都会，那里有许多租界，充斥着大量的外国人。正是他们，带来了近现代的拍卖业。清末文人葛元煦的《沪游杂记》对当时上海的拍卖活动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丙子春间，华人亦仿外国拍卖物件。先期悬牌定于何日几点钟，是日先悬外国旗，届时一人摇铃号召，拍卖者高立柜上，手持物件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竞买，直到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木槌拍桌一声为定，卖与加价最后之客。一经拍定，不能反悔。

而光绪二十四年所刊行的《津门纪略》卷九中记载的，正是其时天津的拍卖场景：

拍卖亦曰“叫卖”。凡华洋家什货物，俱可拍卖。先期粘贴告白，定于某日几点钟。是日先悬旗于门。届时拍卖者为洋人，高立台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争买，直至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锤拍案一声为定，即以价高者得货耳。俗名“卖叫货”。

但中国人的拍卖行为却远远早于此时，而且同样是由佛教僧侣发其端。

佛教规定，“比丘等五众死亡时，其遗物别为轻重之二，金银田园房舍等之重物以之归入常住物，三衣百一众具为轻物，以之分配于现前之僧众，就此分与而不得分与之均等时，则集僧众而竞卖之，平分其价，此竞卖云唱衣。以先定价而唱呼几许也。”(引丁福保《佛教大辞典》)

唱衣的实际情形，佛教清规中有详细的记载，通过对宋元几部清规的整理，其程序及规定如下：

一、抄割衣钵：僧人病危，僧众要检点其衣物，一具录封存，钥匙由首座保管，衣物由专人看守，以备将来估唱。另：若其他人擅自遗嘱衣物，受重罚。《敕修百丈清规》载：“大川和尚住净慈时，首座维那伪作亡僧遗嘱衣物，尝被摈逐。”

二、估衣：由维那估值，首座折中，知客侍者上

单,排字号,记价值;然后依号写标签,贴在衣物上入笼,仍随号依价,逐件别写长标,以备唱衣时用。另:如果亡僧衣钵稍丰,当放低估价,利众以荐冥福。

三、唱衣:在僧堂预置笔、砚、磬、剪、挂络等物,挂唱衣牌,鸣钟集众。专人取来衣物,当众检视封记,于首座处取得钥匙,开取衣物。经过唱诵仪式后,维那拿起一物,唱言:某号某物一唱若干,众人应价,价格由低到高,达到估价即打与此人。知客写名上单,发与凭证。散后本人持凭证取物。另:为公平起见,住持人与内知事不得参与唱衣行为;若未达所估之价,亦要打与最后之僧,如添价太高,维那需再三叮嘱僧众考虑周详;若不买者故增价,犯恶作罪。

四、账式:其记账格式多样,敦煌遗书中有多种唱衣之后的真实账面记录,宋元清规中也存在多种记账模板,暂列宋代释惟勉《丛林校订清规总要》之一种“收钱表散单帐式”如下:

谨具堂头和尚,估唱衣物,支表于后:

一收钱若干(系某件钱到 逐一排列写)

一支钱若干(系某件事用 逐一排列写)

右件支破,尚有若干,斋七追修,命众看经,僧行经钱,支破外,更无余剩。

年 月 日 丧司库子 某 具

把帐执事人两班典丧金押

由上面四个程序可以看到,佛教唱衣就是中国古代的拍卖行为。但这种行为并非独立的商业行为,它仅仅是佛教丧葬仪式中的一部分,没有丧葬的发生,便不会有唱衣的发生,它面对的对象是佛教的僧人而非世俗之人,这些是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拍卖业的显著区别。

唱衣制度同样是源于印度文化,《十诵律》中,详细记载了此制度产生的因缘:

佛在舍卫国,尔时有一梵志,着翅弥楼染钦婆罗,是跋难陀释子旧知识共事。时跋难陀遥见

梵志着翅弥楼染钦婆罗衣来,见是衣已生贪着心。(以下为跋难陀以欺诈言语换取梵志的翅弥楼染钦婆罗衣,梵志后反悔,略)便到跋难陀释子所,作是言:“跋难陀,还我翅弥楼染钦婆罗,此钦婆罗还汝。”(以下为二人争吵言语,略)是梵志急索不得。诸有不信佛法人,闻说是事,以妒心故呵责,作是言:“沙门释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名出家人,故欺调余出家人?”诸有信人,亦复呵责:“云何名比丘,作种种卖买事?”

佛陀定下卖衣之制,初不以买卖亡僧之衣为限,这更接近于现代的拍卖行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丛林清规兴起以后,卖衣发展为仅仅是对亡僧财产的一种分配方式,若从拍卖行业的发展角度看,这成了一种退步。事实上正是这种转变的约束,令中国民间的拍卖事业无法发展起来,以至于在唱衣渐渐成为绝响的时候,中国人的拍卖行为也就基本绝迹了。经济史学家杨联陞曾在《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一文中指出:“可以推断元末以来,拍卖已在寺院中日渐销声匿迹了”,拍卖行业终于成了西方文明的专有品被介绍到近代中国。

以上三条仅仅是作者对佛教某些戒律清规的札记而已,佛教是一个包含了思想、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多种现象的博大的体系,发掘、整理这些现象,有助于今人更详细地认识古代社会生活的原貌,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状况。说到如何将这些文化系统深入地发掘、整理出来,那已经不是笔者所能企及的事业,只能依赖于研究佛教文化的专家、学者了。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佛教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